

# 先生之風，山高水長

## ——紀念《大公報》創刊123周年

趙稀方

研究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大公報》絕對是一個繞不過去的名字。最有名的是一九三三至一九三五年由楊振聲、沈從文、蕭乾等人主編的文藝副刊，名家薈萃，成為京派文學文人的主要陣地。一九三六年，第一屆大公報文藝獎，更是讓青年人嚮往，獲獎作品蘆焚的《谷》、曹禺的《日出》、何其芳的《畫夢錄》一時成為人們心目中純文學的象徵。

抗戰以後，《大公報》轉戰到香港。一九四九年後，《大公報》更是留在了香港，離開了內地讀者的視野。然而，由於我研究香港文學，仍然始終關注《大公報》。在香港，《大公報》風生水起，聯接着內地與海外，發揮着舉足輕重的作用。

一九三八年八月十三日，《大公報》在香港復刊，「文藝」副刊仍由蕭乾主持。京派文人雖然很多到了西南聯大，不過他們的作品仍在《大公報·文藝》上延續，我們仍能看到沈從文、朱自清、李廣田、孫毓棠、汪曾祺、穆旦等人的作品。

新的亮點，是對西北延安文人的關注。因為延安文學在國統區遭封鎖，香港《大公報·文藝》對於延安文學的報道特別引人注意。蕭乾在接手《大公報》「文藝」副刊後發表過一封《尋找朋友，並為「文藝」索文》的公開信，很快就有了響應。第一個給蕭乾寫信的是延安的嚴文井，繼之有南陽的姚雪垠、鄂北的田濤、山東的吳伯蕭，還有卞之琳、丁玲、劉白羽，以及魯藝的陳荒煤等。這些人在抗戰爆發後，先後到達延安及其他根據地，成為延安文學隊伍的骨幹力量。與蕭乾聯繫上了以後，他們的作品就陸續上了《大公報》。這其中有不少知名作品：如沙汀的報告文學《賀龍將軍在前線》、丁玲的散文《我是怎樣來陝北的》

和何其芳的詩歌《夜歌》等。延安文學出現在香港，這是《大公報》創造的一個奇跡。

一九四九年前夕，《大公報》面臨着左右之間的選擇，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十日《大公報》發表《和平無望》，宣告「向人民靠攏」，從此成為左翼報刊。

五十年代初，香港左翼文人北上建國，在美方資金支持下的「綠背文學」甚囂塵上。一九五二年五月五日，《大公報》因為轉載《人民日報》批評港府的文章，督印人費彝民、總編李宗瀛被控刊載政治煽動言論，《大公報》被勒令停刊六個月。不過，《大公報》並沒有屈服，仍然堅守南海一隅，羅孚、嚴慶澍、夏易、何達、梁羽生和查良鏞等人更是在艱苦的情況下支撐起了五十年代香港左翼文壇。

梁羽生和查良鏞的名字大概出乎人們意料，其實他們不但是當時的香港左翼報人，並且今日大紅大紫的新派武俠小說正是最早在左翼文人的報刊上出現的。

五十年代初，左翼方面需要一個較為柔性的報紙，《大公報》旗下就此創辦了《新晚報》。《新晚報》創辦時間是一九五〇年十月五日，當時《新晚報》的副刊，分別是由查良鏞（金庸）主持的「下午茶座」和嚴慶澍（阮朗、唐人）主持的「天方夜譚」，這兩個專欄出現了不少諸如《金陵春夢》等流行世界華人世界的佳作。

刊載武俠小說，正是《新晚報》爭取讀者的策略。一九五三年底，香港爆出一條熱點新聞：太極拳和白鶴拳宣布在澳門舉行擂台賽。一九五四年一月二十日，《新晚報》開始連載梁羽生創作的《龍虎門京華》，次年二月金庸開始連載《書劍恩仇錄》，新派武俠小說從此開始。刊載新派武俠小說是左翼文壇有意而



◀一九三九年九月一日，蕭乾在《大公報》「文藝」副刊發表《一個副刊編者的自白》。

為，背後有中央領導廖承志的支持，應該有吸引讀者、打破「綠背文學」壟斷文壇的動機。效果的確很明顯，《新晚報》刊載《龍虎門京華》等小說後，引得香港及東南亞報刊紛紛轉載，銷量大增。

既堅持立場，又具有靈活性，《大公報》在海外創造了很多輝煌和傳奇：如最早披露收回香港的消息，掀起香港回歸的熱潮；最早報道鄧小平南巡講話，開啟了改革開放的征程等等。雖在香港，《大公報》仍對中國內地產生着巨大的影響。

沒想到，有一天我也幸運地成為《大公報》專欄作者。大概與香港回歸祖國後的歷史需要有關，二〇一七年，《大公報》通過中國社會科學院聯繫到我，讓我在《大公報》上刊載我的香港文學研究成果，並以我的專著《小說香港》為專欄名。記得專欄的第一篇文章是《涼風有信，秋月無邊》，發表於二〇一七年一月十九日。其後專欄一直不定期發表，持續不斷，直到二〇一九年初，我分八次在《大公報》連載《從〈香港文學〉看香港文學》，此

後文章減少。迄今為止，我大約前後發表了四十多篇文章。記得我發表的第二篇文章，題為《〈紅豆〉生南國》，對於三十年代香港一個重要文學期刊《紅豆》作了考訂，糾正了從早期作家侶倫到

當代學者盧瑋鑾的一些說法。沒想到，盧瑋鑾教授不但為不為忤，反而特意通過香港中文大學樊善標教授給我寫郵件，轉達感謝之意。學術為天下公器，此之謂也。據說，「小說香港」專欄吸引了不少注意，香港本地學者和作家都高度讚賞《大公報》關注香港文學的舉動。

時移事易，歷史滄桑，《大公報》目睹並參與中國近代以來的時代進展，令人神往。「雲山蒼蒼，江水泱泱，先生之風，山高水長」，謹以此紀念《大公報》創刊一百二十三年周年。

作者簡介：趙稀方，南昌大學人文學院特聘教授，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所研究員。著有《小說香港》《後殖民理論》《翻譯與現代中國》《香港：報刊與文學》等學術專著十多部。

# 七日談

（北京篇）

## 公主的街角



如是我見 大同

過白塔寺十字路口往北，沿趙登禹路西側步行四百步，左邊便是蘇蘿蔔胡同口。這條胡同很短，西去一百多米，便碰上南北走向的白塔寺夾道胡同而終止。

入胡同東口，北側第一個院子是蘇蘿蔔胡同五號，灰牆灰瓦院門檐下，紅門紅框左上角，釘着紅色門牌，門框居中對稱伸出兩根木柱，六邊形端面淺綠色，上書白色「平」「安」二字。

院門口是一棵大槐樹，圍着槐樹鋪就一塊五步見方的地板台；裹着樹根搭建一個乘涼方形箱棧，上擺三塊花紋布坐墊；倚着樹幹改出一個小桌台。樹幹之上，一隻紅耳藍色布貓，得意地騎在樹杈上。下方的樹疤，被巧妙改作成畫：舞台紅色帷幕從兩邊拉開，一隻美麗的麻雀，閃亮洞出。

院門旁窗口上方搭起四角墜着大胡蘿蔔玩具的帆布涼篷。涼篷下、地板上，物件多多，琳琅滿目，營造出一個槐樹下的精緻空間、童話世界。

首先映入眼簾的是小桌台上，黝黑粗糙的槐樹皮，反襯着一身黃色長裙的小公主雕像，她垂手歡迎着大家的到來。旁邊幾本留言本，夾着黑板小貼士，寫着「留言本——世界上所有的驚喜和好運，都是你積累的溫柔與善良。」

紅色絨布牆面外，立着一塊黑板，上面寫着四個白色粉筆大字：「公主之家」。黑板下方，一枚抱杯北極熊冰箱貼，壓着一張妙應寺白塔寶頂鉛筆素描，旁邊是一張小畫：在白塔和住宅前，一個紅裙小姑娘笑着掄起一隻巨大胡蘿蔔。

窗外紅漆鐵框上站滿各種式樣的小人、小車、小動物玩偶，下面整齊排擺放的六個敞口小盒，盛着不同的文創小產品。

挨着艾菲爾鐵塔模型和架子鼓的西側，在三層黑鐵架架上，擺放着「公主之家吧唧盲袋」「小公主手繪人偶掛飾《蘿蔔公

▶「公主之家」外景。 作者供圖

主）」「蘇蘿蔔胡同五號陶瓷冰箱貼」「可愛包裹」（一）（二）（三）……

一隻黃色木刻臥貓頭頂一塊小黑板寫着：「胡同mini無人自助窗口」「我們所有的¥全部用來給流浪貓買糧」。

正當我上下仔細打量時，旁邊一隻黃眼黑瞳白貓也在上下打量着我。

在黑鐵藝架和院門之間，還嵌着兩個等高的物件，一個是二層小書架，每層疊着十幾本書，有《魯迅雜文選》《自卑與超越》《穆斯林的葬禮》《少兒百科全書》《雕刻時光》《寫真物語》……上面夾着留言：「書籍是造就靈魂的工具——雨果」「免費借閱，如需帶走讀，請加窗口微信。」

書架旁邊挨站着的，是通體黃色的美團充電器，身上寫明「掃碼租借，插入即還」。當然，還有那句鼓勁兒的廣告詞：「美團充電——給生活加滿電」。

春夏秋冬，每當經過這個街角空間，常駐足片刻，卻從未見到主人。

又將迎來夏至，槐樹濃蔭蔽日，佇立於此，仍在思忖：能為小女孩子精心營造如此「公主之家」的父母，會是怎樣的父母？

生長在這樣父母家庭的小女孩，會成長為怎樣的公主？

作為商業或公益模式，這樣一個胡同mini無人自助窗口，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又是如何？

大千世界，見聞不少。姑妄思之，不求甚解。



藝象尼德蘭 王加

所偶遇的十七世紀尼德蘭靜物畫意外地給AI的可信度做了個實測。

或許很多人不知道，坐落在席勒廣場的維也納美院（沒錯，就是那家兩拒希特勒入學的藝術殿堂）內的美術館內其實名作雲集。時隔兩年重返，館內按照時代和地區重新劃分了展陳設計。在「巴洛克在佛蘭德斯」展區中，我在一幅精美的靜物畫前駐足良久，只因一隻坐在暗處、直面觀者且神情嚴肅的黑色小猴。

此幅《有葡萄、灰鸚鵡和猴子的靜物》出自十七世紀尼德蘭畫家揚·費特（Jan Fyt，弗拉芒語Jan Fijt），這位在安特衛普土生土長的畫家，曾是另一位同城動物畫巨匠弗朗斯·斯奈德斯（Frans Snijders）的多年學徒兼助手，因此他尤擅描繪動物。去年在安特衛普特到斯奈德斯的故居參觀，這棟如今與當時著名政客、人文主義者兼藏家尼古拉斯·洛克斯（Nicolaas Rockox）比鄰的宅邸合併為「斯奈德斯與洛克斯之家」（Snijders & Rockox Huis）的博物館，至今還藏有多幅斯奈德斯的真跡。想我曾身臨其境站在費特也曾經出入的恩師宅邸，頓覺穿越時空的距離感被瞬間拉近。

儘管在安特衛普出生並長眠，費特曾於一六三四年至一六四一年在意大利多地遊歷，並在羅馬加入了當地的北方畫家社團「畫家行會」（Schildersbent）後收穫了「金翅雀」（Goudvink）的美譽。追根

## 讓AI吃癩的白耳絨猴



◀揚·費特《有葡萄、灰鸚鵡和猴子的靜物》局部。 作者供圖

溯源，《有葡萄、灰鸚鵡和猴子的靜物》畫中那典型的卡拉瓦喬主義式（Caravaggisti）光影特徵絕非偶然。在昏暗的背景下，大量從藤製編筐內散落出的晶瑩剔透的葡萄佔據了絕大部分畫面，加上右下角的幾個蘋果，出鏡的水果和物品與卡拉瓦喬著名的《水果籃》高度雷同。但區別在於，卡拉瓦喬名作中有蟲洞的蘋果和腐爛的枝葉和諸多十七世紀尼德蘭靜物畫一樣都包含「虛空」（Vanitas）的道德隱喻，但費特此作因完好無損的新鮮水果、在畫中分列左右的非洲灰鸚鵡和白耳絨猴（The Buffy-Tufted Marmoset，學名 Callithrix Aurita）則具備更多「華麗靜物」（Pronkstilleven）中僱主試圖通過珍貴事物炫富且滿足其文化好奇心的屬性。

早在一五六二年，老彼得·勃魯蓋爾（Pieter Bruegel the Elder）就在安特衛普留下了兩隻原產地非洲的紅帽白眉猴（Cercopithecus Torquatus）的身影。約一個世紀後，費特筆下有着人臉般膚色、通

體黑色卻在耳梢上長有兩簇白毛的白耳絨猴則是巴西東南部大西洋雨林生物群系的特有物種。很難想像，這種如今被國際自然保護聯盟（IUCN）列為全球最瀕危二十五種靈長類動物之一的小猴竟於十七世紀中葉就已登陸歐洲。究其原因，要歸結於荷蘭共和國於一六三〇年至一六五四年的荷屬巴西（Dutch Brazil）時期對巴西東北部的殖民統治。因此，成立於一六二一年的荷屬西印度公司（WIC）能夠將大量原產巴西的蔗糖、煙草、咖啡、巴西木等珍貴原材料通過商貿運往歐洲。稀有的白耳絨猴也藉此搭上了「順風船」，飄洋過海抵達尼德蘭地區。參照費特完成此作的時間是一六五〇年，正值荷屬巴西末期，這隻「人面白耳」的小黑猴也機緣巧合地入了畫，客觀成為了這種巴西稀有物種踏上十七世紀歐洲大陸的罕見圖像例證。

逛完維也納美院出來的當晚，我用AI搜索了詞條「荷蘭黃金時代中的白耳絨猴」，試圖獲得更多相關信息，結果得出的答案是：「原產地巴西東南部的白耳絨猴與荷蘭黃金時代並無直接關聯。像絨猴這樣的外來動物有時被作為珍品帶到十七世紀的歐洲，但沒有具體的歷史紀錄將此特定物種與荷蘭黃金時代聯繫起來。」想到當天早些時候才在博物館內看到費特筆下活生生的圖像紀錄，不由得感嘆：沒想到一隻小小的白耳絨猴竟然讓如日中天的AI「吃癩」了。客觀來說，人工智能基於已知數據的採集。哪怕AI再先進，若數據不完善它也就不能作為嚴謹學術研究的背書。說白了，那些人文歷史中由前人留下的珍貴文獻和圖像資料永遠無法被AI取代，人工智能可以提供參考，甚至可以替人總結歸納，但不具備作為學術研究的信息源而使用的準確性及權威性。

## 習慣的力量



人生在線 張君燕

每次看到鄰居李老伯，我總會想起小說裏的一個人物——那個承受了巨大苦難，晚年孤苦伶仃地與一頭老牛相依為命的農民福貴。李老伯的經歷與福貴極其相似，不同的是，他還有一個坐在輪椅上的老伴。每天傍晚時分，李老伯會推着老伴在小花園裏散步，大多數時候，老兩口只是安靜地走走看看，偶爾說起些什麼，兩人也會笑起來，笑聲很低、也很短暫。

與李老伯閒聊，我抱怨生活太難。彼時，我剛剛失去一次晉升的機會。李老伯

說：「看開點，會好起來的。」「也對，說不定日後還會有晉升的機會。」我半是期待半是自我安慰。李老伯卻搖頭笑道：「我是說，你會習慣這些不如意，直到不再為它們煩惱。」

我們常常說起「能耐」這兩個字——看人家，多有能耐！很多人只是把它理解成一種成就，但其實它的含義遠不止此。所謂「能耐」，有「能」也有「耐」，就是說，一個人有輝煌的時候，也就會有落魄的時候，能享受得了成功時的高光時刻，也應該能耐得住失敗後的落寞與潦草。

這些都是李老伯跟我說的話。很顯然，李老伯所經歷的苦痛都藏在這幾句看

似平淡的話背後。「有能就有耐，一個人哪能一輩子順利？好日子過完了，就得過點苦日子，不管咋樣，都能過下去，習慣就行了。」

「習慣」兩個字，聽起來似乎是被動地接受，甚至是一種麻木。但其實，習慣本身就是一種強大的力量。首先，它是心態上的平和與淡然，然後是行動上的改變或者適應。

實際上，我們大部分人都是一邊抱怨着讓自己習慣，一邊繼續往前走。習慣意味着接受，而只有接受後，才能真正面對現實，繼而去努力作出改變。就這樣，走過一個又一個看起來艱難甚至無法逾越的難關。